

从形名学到符号学：一个学术史的梳理与反思^{*}

祝东

(兰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730000, 兰州)

摘要 以墨家、名家的名辩学为代表的古形名学中蕴藏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内容。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现代符号学兴起并大规模引入中国学界是1980年代的事情,此前对古形名思想的探索集中在哲学、逻辑学领域,此后学界才开始从符号学角度检视古形名学,古形名学符号思想研究在20世纪最后十年得到了拓展。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为古形名符号思想研究的深化期,而第二个正在发展的十年则可视作锋面拓展期,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范围都得到了拓展。而从对古形名学符号思想研究到对整个中国符号学遗产的梳理和阐发,对促进中外学术思想的交流对话、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当代中国学者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

关键词 古形名学;名辩学;名家;墨家;逻辑学;符号学

分类号 I206.2

尽管现代符号学的历史并不长,但是人类用符号来表达意义和思想的历史却是和人类伴随始终的。早期中国、古希腊、古印度的先哲都曾经对符号与意义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有效思辨,而以中国古代墨家、名家为代表的古形名学对名实关系的思考与探索,被认为是早期中国符号思想研究的集大成者,用现代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去激活古形名学,对促进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发展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以下试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一梳理,以期能够掘幽发微,鉴古知来。

1 历史的回溯:古形名学的现代转换

墨家和名家的形名之学汉代后逐渐湮没不彰,仅有西晋鲁胜《墨辩注》《形名》等著作,惜已失传;至晚清民初诸子之学研究复兴,此二家之学才得到新的重视,但是当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献辑佚、考证、训诂诸方面,如陈澧的《公孙龙

子注》、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梁启超的《墨经校释》等。这种文献整理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扎实可靠的资料,居功甚伟。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现代学科分类的大部分学科专业及名词术语也是在这个时候输入进来,如哲学、逻辑学、文学、伦理学等。在向西方学习的语境下,中国学者一方面进行大量的翻译译介西方学术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充分发掘中国本土学术资源,进行格义对接,如孙诒让、梁启超等学者先后发现中国传统墨家学术中蕴藏着西方逻辑学相同的思想因子,并开始加以比照阐发。如笔者所言,在各门学科的草创期,因为理解、消化、吸收的程度不同,会存在比附对接的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清末民初的学者在学科立场上,“并不是为了用中国古代学术去印证西方学说,而是因为名辩学说确实包含了丰富的逻辑思想”^[1],更为重要的是西方逻辑学的输入为国内学界研究名墨之学开启了新的学术视角,对有效激活传统学术资源起到了助推作用。当然,这

收稿日期:2017-11-06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

作者简介:祝东,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化与传统符号思想。

种学术研究的背后在当时多少还有建立民族自尊心文化自信心等方面的因素。

西方逻辑学进入中国的时候,就是以“名学”“辩学”的名称进行格义对接的,如严复翻译英国弥尔(J. S. Mill)的《逻辑学体系——归纳与演绎》时用的中文名字即是《穆勒名学》(1905),翻译英国逻辑学家耶方斯(W. S. Jevons)的《逻辑入门》时用的汉译名称为《名学浅说》(1909);王国维翻译出版的耶方斯的《逻辑基础教程:演绎与归纳》用的汉译名字即是《辩学》(1909),名学、辩学即是逻辑学的汉语意译(两个意译在理解上有差别,这种差别不是个人偏好,有意思的是,不同的译名代表了不同的逻辑学观念)。这种翻译表明逻辑学进入中国伊始,最初的那些逻辑学的介绍者在学科立场上,并不纯粹是为了用中国古代学术去印证西方学说,而是因为名辩学说确实包含丰富的逻辑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辩者虽也有以‘正名’议论政治、讲习道德的风气,但是他们的重点还是放在纯逻辑的探究上”。^[2]名辩之学亦成为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代称。一般说来,以西学为本位,以西统中,一般用“论理学”;以中通西,从中国本位出发,一般用“辩学”,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清楚的认识或成见。中国亦展开了以古代名辩之学为主的逻辑学研究,如1904年梁启超发表了《墨子之论理学》,开启了近代名辩逻辑研究之先河;1905年王国维撰有《周秦诸子之名学》(值得注意,胡适的博士论文乃至后来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可以说是从这篇文章的展开),1917年胡适用英文写成了《先秦名学史》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逻辑史专著;1919年章太炎《原名》出版,全面探讨中国古代名辩思想。此后对先秦诸子的名辩逻辑研究逐渐风行起来,陈显文于1925年出版了《名学通论》;郭湛波1932年出版了《先秦辩学史》,为集中研究先秦逻辑史的专著;虞愚于1937年出版了《中国名学》;伍非百也于1949年完成出版了他的《中国古名家言》修订本。用现代逻辑学来疏解中国古代的形名学,对中国古代名辩逻辑的研究有较大的开拓。

这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伍非百的《中国古名家言》,它或许可以视作中国古形名学的集大成者。其中收录了《墨辩解故》《大小取章句》《尹文子略注》《公孙龙子发微》《齐物论新义》《荀子

正名解》《形名杂篇》等研究内容,由这份目录我们可以看到,墨家和名家是古形名的主要部分。而从墨家《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小取》与名家《尹文子》《公孙龙子》的主要内容来看,名家与墨家是有很深厚的学术渊源的。所谓名家,据伍非百先生言,即是专门研究与“名”有关学术的问题,如名法、名理、名辩等,其中以公孙龙为代表的学者主研“正名”“析辞”“立说”“名辩”等学问。在《中国古名家言序录》中伍氏指出:“‘名家’之学,始于邓析,成于别墨,盛于庄周、惠施、公孙龙及荀卿,前后历二百年,蔚然成为大观,在先秦诸子学术中放一异彩,与印度的‘因明’,希腊的‘逻辑’,鼎立为三。其时代亦略相当。”^[3]墨家是春秋战国时的另一学术流派,其学说保存在《墨子》一书之中,今存《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被认为是后期墨家学派的学术观点,晋朝鲁胜曾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抽出来作《墨辩注》,并在《墨辩注叙》中云:“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义于世。……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4]认为名家公孙龙皆祖述墨家之学,而名家学说幸由《墨辩》才传存下来。近人胡适不承认学术史上有名家,认为名学(逻辑)是一种学术方法,先秦诸子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名学,但是将惠施、公孙龙等后世命名为“名家”的学派视为墨家别派。^[5]纵观前贤所论,一派主张用墨统名,一派主张以名统墨,其实无论名家还是墨家,都对形名学有深入研究。如果按照传统观点将《墨辩》视作后期墨家学术的话,可以看到他们确实已经关注到了名辩问题,并有深入辨析,至惠施、公孙龙处发扬光大。名、墨二家在学术上关系密切,皆关心名实之学,如《经下》第六十八条谓:“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不止于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则彼亦且此也。”学界多认为这一条基本上是针对公孙龙“彼彼止于彼”而发的,是对公孙龙学说的补充发挥。由是我们可以看出学术史上名家与墨家两派

在学术思想上确实存在很深的渊源关系。他们在名辩问题上进行了深刻的思辨,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形名学的发展实绩。

建国初期,名、墨学术思想还有一个小的热潮,相继出版了一些相关著作,如詹剑峰的《墨家的形式逻辑》(1956),栾调甫的《墨子研究论文集》(1957),谭戒甫的《墨辩发微》(1958),高亨的《墨经校诂》(1958),在理论阐发和文献整理方面皆有一定的实绩,但是这种研究很快由于历史原因而终止,没能持续下去。到文革结束之后,学术思想得以解放,一批研究传统名辩逻辑学的著作相继问世,如周文英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稿》(1979),温公颐的《先秦逻辑史》(1983),周云之、刘培育的《先秦逻辑史》(1984),周云之的《公孙龙子正名学说研究——校诂、今译、剖析、总论》(1994),《名辩学论》(1996),崔清田主编的《名学与辩学》(1997),林铭钧、曾祥云的《名辩学新探》(2000)等,对名辩逻辑思想的研究多有推进,虽间或涉及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但主要属于逻辑学视角。

名辩之学与逻辑学关系密切,而逻辑学与符号学也是紧密相连,如符号学家皮尔斯就认为“逻辑学在一定意义上只是符号学的别名,是符号学带有必然性的或形式的学说。”^[6]符号学家吉罗亦云:“逻辑学的目的在于确定可以在实体之间或在各体之间建立的各种类型的关系,并保证这些关系的真实。它表明在这些的情况下,它就是一种编码。”^[7]中国学者李先焜也在1980年代中后期先后撰文《语言、逻辑与语言逻辑》(1986)、《指号学与逻辑学》(1988),剖析逻辑学、符号学二者之间的关系,指出逻辑学本身研究的对象就是一种符号,但效果影响似乎并不理想,“由于它跟传统的观念相距太远甚至背道而驰,因此很难为逻辑学界一些同志所接受。”^[8]从后面的实际研究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出研究队伍确实比较狭窄。直到20世纪末,中国学者才开始在惊呼:“今天我们应该走出误区,抛弃过去的研究方法,采用现代符号学理论,重新探讨和评价名辩学。20世纪新兴起的现代符号学理论比传统的逻辑学和语言学更具概括性、更接近思维活动的自然。借助于符号学,我们可以对名辩学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研究,以期找出名辩学的学科体系及发展规律。……名学从其整体

上说,主要是关于词项符号的理论;辩学史研究辩论学的学问。名辩学的许多问题,必须用符号学分析才能解决。”^[9]由是我们可知名辩学与逻辑符号学关系紧密,中国古形名学中的名辩学中确实含有丰富的符号学思想。

2 符号学视域:古形名学的再次发现

现代符号学的建立是20世纪以来的事情,而“符号学”这个中文词,则是赵元任1926年在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文章中提出的。赵毅衡先生研究指出赵元任应是独立于索绪尔或皮尔斯提出这门学科的,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10]中国学者较早从现代符号学角度考察古形名学符号思想的允推钱钟书,他在1960—1970年代就曾注意过中国言意论与西方现代符号学之间的关系:

“言”“文”“物”三者析言之,其理犹墨子以“举”“名”“实”三事并列而共实也。《墨子·经》上:“举,拟实也”;《经说》上:“告、以之名举彼实也”;《小取》:“以名举实,以词抒意。”……近世西人以表达意旨(semiosis)为三方联系(trirelative),图解成三角形(the basic triangle)、“符号”(sign, symbol)、“所指示之事物”(object, referent)三事参互而成鼎足。“思想”或“提示”“举”与“意”也,“符号”“名”与“文”也,而“所指示之物”则“实”与“物”耳。^[11]

钱钟书以其学贯中西的宽广视野敏锐观察到中国先秦墨家学术与现代西方符号学之间的学术关联,这在当时学术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然而像钱先生这样的研究在当时学界也确实少见。由钱先生的论述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即便是“拿来”符号学,至少还有这样的学术意义,即发现了中国原有的“符号学资源与思想”。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进一步引进的同时,消化,乃至清理或者建立“中国的”符号学乃是中国学界的责任。

现代符号学开始成规模传入中国并在学界引起反响还是1980年代的事情。然而相对于易学符号学的研究来说,对古形名学符号思想的研究确实相对慢了半拍,我们现在能够检索到的资料可以看出,1980年代用符号学理论研究名辩学

的论文不多,但毕竟开启了用符号学研究古形名学的先河。如胡绳生、余卫国的《〈指物论〉:文化史上第一篇符号学论文》,用索绪尔的能指/所指符号学概念对公孙龙《指物论》中的“指”“名”“实”等概念进行了辨析,指出:“公孙龙子的‘指’范畴,实际上包含了从主体、能指到所指、对象的整个指认过程,体现了符号化过程的本质。”^[12]胡文作为国内第一篇用符号学理论阐释名辩学的论文,文章的创建之功还是值得称许的。刘宗棠的《〈指物论〉与指号学》(1989),从符号学的观点来理解“指”与“物”,认为指即是“指号”(即符号),而名则是“概念”,是符号相应的心灵的表现者,即“解释者”,也即思想,物即是“事物”,也即对象。这两篇文章皆是直接将“名”等同于事物的名称、概念,还是值得商榷的,这一点直到1990年代才由李先焜先生辨明。这也说明国内学界对符号学理论还需要一个学习消化的过程。1990年代中期,中国学界开始有更多的关于古形名学的符号学研究。如李先焜的《公孙龙〈名实论〉中的符号学理论》,文章依据皮尔士与莫里斯的符号理论对公孙龙的《名实论》进行了剖析,指出公孙龙的“名”是“名称”,而非“概念”,因为公孙龙的语义理论属于指称论,只考虑名称的外延意义,而忽略了其内涵意义^[13],这也算是对胡绳生文章的一种修正,反映出中国学者对符号学研究的深化。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符号学界终于团结起一批学术同仁,并成立了相应的学会,如1989年中国逻辑学符号学专业委员会成立,1994年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在苏州大学成立。这对中国传统符号学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我们从稍后的系列学术论文中也看到了这种积极影响。如赵平《〈公孙龙子·名实论〉的指称观》(1996),周文英《〈公孙龙子〉中的哲学和逻辑思想》(1996),曾祥云《〈指物论〉:中国古代的符号学专论》(1996)等,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古代名辩逻辑进行了探析。如林铭钧等学者《从符号学的观点看先秦名学》(1995)一文,根据汉字的表意文字特征,指出我国先秦文字的象形性质和表意特征决定了“名”的表意功能,也即名本身是表意的,先秦名辩之名是形、声、意的结合体,本身集能指与所指于一身,这是中西文字的根本

性区别,也是先秦之名的特有功能;而先秦名学的兴起则与政治伦理领域的“名实散乱”有关,正名成为当时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名实关系问题也成为学术论争的焦点,古形名学亦因此而来;最后,作者还对名的作用、命名原则和方法进行了分析,并区分了先秦名学与传统逻辑的概念学。然而作者认为名实关系、名形关系与名实关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实并非事物的本质属性似乎还可以商榷。在笔者看来,“实”不同于“物”,物是具有形色的个体事物的综括,而实则是从物中抽象出来的一些具有共性的本质,名是表征实的,同时又可指称物,如果将名视为概念符号的话,那么物则可视作客观对象(个别),而实则是抽象本质(共相)。

随着研究的推进和深入,先秦形名学研究的论著、论文也日渐增多,既有对古形名学的综合性研究,又有关于名学的个案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宏观研究方面,如苟志效《先秦哲学的符号学致思趋向》(1995),徐阳春《从符号学看中国古代名学》(1998),曾祥云、刘志生《名学与符号学》(1999)等;微观研究如林铭钧、曾祥云《以符号学析“白马非马之辩”》(1996),李先焜《〈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1996)等。通过梳理可知,这个阶段对形名学的“名”的研究越发深入,如李先焜对儒、墨二家之名的比较分析,指出“言(话语)”是墨经语用学的基本范畴,而“名”则同时具有符号性与行为性,墨经是将符号性与行为性结合起来论述的;墨家的正名学说不同于儒家的正名学说,墨家从精确表达思想的角度,从语言学、逻辑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对“名”本身进行了分析,使正名超越了政治伦理范畴,成为名辩学的组成部分;而墨家的辩也超越了单纯的政治、伦理学范围,谈的是语言学、逻辑学与符号学的问题,特别是语义学与语用学方面的问题,具有逻辑语用学性质。^[14]李先焜在《论先秦名家的符号学》(1995)对名家之名进行了分析,指出名家学派公孙龙对“名”的定义揭示出了名的符号性,名家在先秦诸子中是一个真正以研究“名”的符号为主的学派,并具体分析了邓析、尹文、惠施、公孙龙的符号学思想,还用元语言理论去分析公孙龙“白马非马”的命题,指出“非”不是“不属于”,而是“异于”之意;在这里“白马”和

“马”理解为对象语言,而“非”则是元语言,这样就便于读者理解“白马非马”的命题了。

值得关注的是这个阶段有一位从语言符号学角度切入名辩学研究的学者,即是屠友祥先生。屠氏的《言境释四章》(1998,2004,2011)对《老子》《论语》《庄子》《公孙龙子》形名思想的研究。但是屠氏亦坦言:“鉴于学术传统纯粹性的原因,没有使用一个西方符号学的术语,完全依循‘古形名学’的路径展开的。”^[15]如屠氏在释“物莫非指”时指出:“指”为指而谓之,使之显现之意,也即是“指谓”,有指谓的话,必须有意识活动参与其中,“指与物之间发生关系,亦必有理路存在,也就是说,其间有过程,有方向。”^[16]事物在意识的意向性压力之下成为指谓对象,人的每一次意义活动必然是意向性投射而产生的,如赵毅衡先生所言,“意义世界却是人类的意识与事物交会而开拓出来的”^[17],意向性投射必然是有过程、有方向的投射。可见屠氏尽管没有用符号学术语,但是其理论旨趣却与符号学是相同的。

从20世纪后期的名辩符号学研究的现状来看,我们发现主要集中在逻辑符号学领域,这种现象说明古形名学符号思想研究并没有真正展开来,而符号学本身也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学术发展和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推进需要有更多人文社会科学参与进来,对古形名进行不同角度的观照。

21世纪以来,名辩之学的研究队伍有所扩展,但是研究主体的学术背景依然以从事逻辑哲学的学者为主,间或有像屠友祥这样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参与。相较而言,这个时间段的相关研究趋向是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如张长明、曾祥云《从符号学的观点看〈尹文子〉的名学》(2001),曾祥云《〈墨经〉名学的现代解读——从语词符号的角度》(2002),杨文的《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墨经〉名学》(2005),刘湘平的《从墨家的“名”论看起语言哲学思想》(2008),邹劼《〈公孙龙子〉中的语言学思想研究》(2011)等。通过研究史的检索发现,这个阶段的研究整体上有一个由逻辑符号学向语言符号学转向的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在2010年之后有拓展深化的趋向。如笔者的《论形名:从语言规范到行为秩序》则综合语言符号学、社会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等角度对古形名学进行了综合性的多维透视,指出这是一个“以‘名’为

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符号学发展模式”。^[18]《名与礼:儒家符号思想及其深层意识形态分析》则从文化符号学、伦理符号学、语言符号学诸领域对儒家名礼符号思想进行了多维透视^[19],在一定程度上尝试着拓展了传统符号学的研究锋面。

3 现状的反思:传统符号学任重道远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从现代逻辑学到当代符号学的引入,中国的古形名学被逐步激活。从古形名符号学思想研究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研究在20世纪最后的十年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21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十年,其研究现状却不容乐观,基本上是对前期研究的重复或者细化,开拓不多。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研究梯队建设不够,任何一门学术要想发扬光大,必须要有一批稳定的、成梯队状的学者群体。通过前面研究现状的检视我们可以看出从事这个课题研究的人员不多,而且后继乏人。为此,必须加紧培养一批热爱这项研究并对名辩符号学有一定悟性的能够稳定从事该项研究的研究队伍出来。如果没有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那么其他就无从谈起。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关研究者主要集中于逻辑符号学领域,间或有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参与,但是为数不多,这样的话,就使得古形名学的“符号学诸领域”得不到有效展开,不能多维透视,圆形观照,这本身也违背了符号学作为跨学科方法论研究的宗旨,自然限制了对古形名符号思想研究的拓展。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则是尽管在20世纪后期中国逻辑学符号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相继成立,但是学会成员都相对集中,一个集中在逻辑学领域,一个则主要在语言学(特别是外国语言学)领域,因为学科背景的不同,两个学会整体上缺少交流碰撞,在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此外,这个阶段的符号学理论文献的译介工作也相对不足,这对促进中西学术对话也造成一定的影响。

而要突破这种研究瓶颈,全面深入推进中国古形名符号思想的研究,还必须继续从符号学角度出发,去激活我国的传统学术思想,如朱前鸿

所言:“从符号学的角度探析先秦名家四子的名实思想,可以丰富对现代符号学的认识和方法论的认识,廓清中华民族特色的符号学思想,加深对我国古代逻辑思想和思想家的认识,同时,也可以为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工具和研究案例。”^[20]其实不只是逻辑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伦理思想、语言思想等领域,都会有新的认识和提高。对此,笔者认为要将这中国古形名符号思想研究继续深入下去,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拓展。

首先是拓展研究队伍、丰富研究方法的问题。笔者建议要扩展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以宽容的心态吸纳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人参与到这个研究中来,比如从事语言学的研究者、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他们分别有自己的学术兴趣和视角,看问题的角度肯定也各异其趣,研究的方法路径也会各有特色,跨学科思想方法的碰撞肯定会产生新的火花。其次是均衡研究对象的问题。从研究现状我们可以看出在对古形名学符号学思想研究中,主要集中于名家与墨家,而且名家显然热于墨家,这种冷热不均的现象势必造成学术资源的浪费及研究空白的持续闲置;除此之外,儒家的典籍《论语》《荀子》《礼记》,道家的典籍《老子》《庄子》,法家的典籍《管子》《韩非子》,以及出土文献,如《黄帝四经》等,都要纳入古形名符号思想的研究视域。第三是要加大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研究著作的译介,扩大符号学的研究锋面与理论视域,更全面而广泛地促进中西学术的交流碰撞。而我们也相信随着研究视域的扩大、研究队伍的壮大和研究方法的多元互动,一定会促进古形名符号思想的研究的发展。

令人兴奋的是,这种研究现状在21世纪的

第二个十年间已经开始得到改观。笔者近几年参与中国语言符号学学会和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学会的会议,发现已经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参与其中并开始崭露头角。特别是2015年7月在四川大学召开的首届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国际学术会议上,笔者成功组织了“中国传统思想与符号学遗产”圆桌会议,袁峰、刁胜虎、张劲松、何光顺、李卫华、吴中胜、杨赛等中青年学者分别从哲学符号学、传播符号学、文化符号学、文学符号学、伦理符号学等角度对传统符号学遗产进行多维透视,并结合当今中国文化现状和发展的符号学研究来谈,使符号学很好地与当今转型期的社会文化现象紧密结合,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现实关怀,“学者们既重视经典,更兼有思想遗产的当下意义思辨”^[21],大大拓展了传统符号学思想研究的锋面,真正实现了符号学作为跨学科方法论研究的目的。此外,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团队近年的主攻方向之一便是传统符号学遗产,而且在这个领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者,如苏智的易学符号学研究、黎世珍的两汉术数符号思想研究、兰兴的阴阳五行符号思想研究、孙金燕的禅宗符号学研究、王墨书的阳明心学符号思想研究等,将古形名符号思想研究拓展到整个中国符号学遗产的研究论域。笔者亦有幸参与其中,近年在先秦符号思想领域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工作。

如胡易容等学者所言:“中国文化思想及其东方智慧对符号学具有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启示方式,如何进一步挖掘弘扬将成为中国符号学发展路径上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课题。”^[22]相信随着中国符号学研究的发展,包括古形名学的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亦将得到全面的梳理研究,中国的符号学者会向世界符号学界贡献中国的符号学思想、传播符号学的“中国好声音”。

参 考 文 献

- [1] 祝东. 从汉语哲学到汉语学术[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3-03
- [2] 温公颐. 先秦逻辑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5
- [3] 伍非百. 中国古名家言[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3
- [4] 房玄龄,等. 晋书·册八[Z]. 北京:中华书局, 1974:2433-2434
- [5] 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M]. 长沙:岳麓书社, 2010:142
- [6][20] 朱前鸿. 先秦名家四子研究[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29,34
- [7] 皮埃尔·吉罗. 符号学概论[M]. 怀宇,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68

- [8] 李先焜. 指号学与逻辑学[J]. 哲学研究, 1988(8): 61-68
- [9] 林铭钧, 曾祥云. 名辩学新探[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0: 361
- [10] 赵毅衡. 中国符号学六十年[J]. 四川大学学报, 2012(1): 5-13
- [11] 钱钟书. 管锥编·册三[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1863-1864
- [12] 胡绳生, 余卫国. 《指物论》: 文化史上第一篇符号学论文[J]. 宝鸡师院学报, 1988(3): 11-18
- [13] 李先焜. 公孙龙《名实论》中的符号学理论[J]. 哲学研究, 1993(6): 62-69
- [14] 李先焜. 《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J]. 湖北大学学报, 1996(3): 18-24
- [15] 屠友祥, 祝东. 从古形名学到语言符号学——屠友祥教授访谈[A]//蒋晓丽, 赵毅衡. 传播符号学访谈录[C].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7: 79
- [16] 屠友祥. 言境释四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338
- [17] 赵毅衡. 意义理论, 符号现象学, 哲学符号学[J]. 符号与传媒, 2017(2): 1-9
- [18] 祝东. 论形名: 从语言规范到行为秩序[J]. 江西社会科学, 2017(8): 104-111
- [19] 祝东. 名与礼: 儒家符号思想及其深层意识形态分析[J]. 兰州大学学报, 2018(3): 151-157
- [21][22] 胡易容, 谭光辉, 李玮. 中国符号学的新展面——第一届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15(3): 293-301

From Xingming Xue to Semiotics: A Screening and Reflection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ZHU D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Lanzhou University, 730000, Lanzhou,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bundant semiotic thoughts in the old Xingming Xue represented by the Mohist School and the Ming-logics of the School of Ming. From the point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the modern Semiotics was introduced on a large-scale into Chinese academic field in 1980, before which year the probing to the Xingming Xue was within the subjects of philosophy and logics. It was not until 1980 that the academic circle began to study Xingming X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Thereafter the study of the old Xingming Xue had been expanded in the later period of 20 century. The first 10 years of the new century is the period of the deepening study of the old Xingming Xue, and the second 10 years is the expanding period, whether it is in methodology or the research area.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thoughts in the old Xingming Xue and review and interpret the whole Chinese semiotic heritage as well, which will promote the Sino-foreign academic exchange and dialogue and sprea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which is also the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of the Chinese scholars.

Key Words the old Xingming Xue; the Ming-logics; the School of Ming; the Mohist School; Logics; Semiotics